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

(1978-2008)^①

吴愈晓

提要：已有关于中国教育分层的文献大多关注总体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而忽略了因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tracking）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通过分析 CGSS2008 数据，本文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层次的升学路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户籍、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教育）影响子女的升学路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或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轨道而非职业教育轨道。另外，前一阶段在重点学校就读对获得下一阶段重点学校教育机会会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论。作者认为，重点学校制度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重点学校制度 学轨制 有效维持不平等 教育获得

一、引言

教育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它又是一种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因此，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教育同时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和结果变量。除此之外，教育还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故此，教育不平等研究是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呈现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料显示，截止 2010 年底，

^① 本文的初稿曾在 2012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银川，2012 年 7 月 13-15 日）“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及其后果”分论坛上宣读。本研究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现代教育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研究”（批准号：CFA090096）以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11）经费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2.5%；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 3105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 26.5%（中国教育部，2011）。而另一方面，在教育急速扩张的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甚至呈现加剧的趋势（杨东平，2006；李春玲，2010）。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教育公平问题特别是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得到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综观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社会学领域关于中国教育分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探讨体制转型（即市场化改革）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多项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与改革前相比，1978 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Zhou et al., 1998；李春玲，2003；李煜，2006；吴晓刚，2009）。其二是检验中国的教育扩张（尤其是 1999 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急剧扩招）与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如期导致教育不平等程度的显著下降，甚至相反出现了上升的势头（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Guo and Wu, 2010；吴愈晓，2013）。

笔者认为，虽然已有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及其变化趋势，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分流体制——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tracking）——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培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急需的科技人才，在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目的在于将稀缺的教育资源集中用于优秀的学生身上（Pepper, 1978）。虽然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的人才问题，但是其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各界的重视。例如，这种制度导致教育资源、生源和师资力量的分配严重不均，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成为阶层固化或加大社会两极分化的制度设置（杨东平，2005；2006）。尽管学术界和教育管理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围绕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讨论更多是停留在理论观点讨论的层面，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除了重点学校制度，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教育分流体制是学轨制，即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和普通学术教育（academic education）的分化。在我国，高中阶段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包

括技工和中专)，而大学阶段分为高等职业教育（大专）和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由此看来，除了探讨总体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升学的轨道差异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居民升学的轨道选择？目前鲜有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经验检验。虽然李春玲（2010）最近的一项研究检验了大学阶段大专和本科升学机会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但这项研究仅限于大学阶段，而没有涉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情况。在本研究，笔者将对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升学轨道差异进行综合的实证检验。

简而言之，重点学校制度产生了重点与非重点的升学路径分流，而学轨制则产生了职业教育和普通学术教育的升学路径分流。由于不同的升学路径选择所导致的教育经历及其所获得文凭的价值大相径庭，而且对毕业后的地位获得有重大的影响（刘精明，2004；王威海、顾源，2012），因此探讨不同个体的教育路径差异对理解我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的分层流动模式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将应用同一个分析框架，探索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因上述两种教育体制所导致的升学路径分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以此理解现阶段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结构与特征。

二、理论视角：精英教育体制与有效维持不平等

特纳（Turner，1960）曾经分析比较了两种不同的精英选拔模式及其相应的教育制度。一种是“赞助性流动（sponsored mobility）”模式，即早期将精英候选人选拔出来，并赋予他们更好的社会资源，以赞助或保护他们成为将来的社会精英。与这种精英选拔模式相应的是精英教育体制，即学校有等级划分，并将好学生（精英候选人）与普通学生分开来进行教育，前者上更好的学校，享有更好的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另一种是“竞争流动（contest mobility）”模式，即赋予所有社会成员相同的机会进行公平竞争，最终胜出者成为社会的精英。而与这种模式相应的教育体制是大众教育体制，学校（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没有等级区分，也不会将学生进行分等并提供不同的教育，即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简而言之，精英教育体制体现的是教育机会的特殊主义原则，即

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不均的。而重点学校制度以及各种学校分层方式则是精英教育体制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即学校有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精英与非精英学校或贵族与非贵族学校等不同形式的等级分化。在不同等级的学校接受教育意味着享受不同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和各种软硬件环境），也意味着后教育阶段不同的生活境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中学阶段的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路径分流对个体的职业获得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王威海、顾源，2012）。除了重点学校制度以外，学轨制（tracking，即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化）也可以被看作是精英教育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大多数国家，学术教育轨道通常是面向大学或更高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精英人才，而职业教育轨道则是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目的是为了培养普通的技术人员或职员。一些社会学家将学轨制看作是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机会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为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中上阶层的孩子更可能进入学术教育轨道，毕业后获得更高地位的职业，而下等阶层的孩子则更可能进入职业教育轨道，从而影响了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相应更高的职业地位（Shavit & Mueller, 2000）。因此，在精英教育体制通行的社会中，个体的教育成就不仅仅体现在获得多少数量的教育或获得哪一个教育阶段（如小学、初中、高中或大学）的文凭，还体现在获得什么“质量”（不同等级或性质）的教育，因为后者对个体地位获得的影响力可能比前者更大。由此看来，关于教育获得或教育分层的研究，除了关注教育数量或总体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之外，仍需探讨教育质量的差异。

教育分层研究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是“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ypothesis, 简称 MMI）（Raftery and Hout, 1993）。拉夫特里和豪特（Raftery & Hout, 1993）通过分析爱尔兰的数据资料发现该国家的教育总量扩张并未导致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化趋势，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 MMI 理论，认为教育扩张不一定会导致教育平等，因为上层阶级或优势阶层才是教育供给增加的受益者，除非这些上层阶级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教育机会才会惠及下层阶级从而出现平等化趋势，否则教育不平等将以最大化的形式维持着。该理论提出后，受到了两方面的质疑，首先，虽然 MMI 理论被一系列基于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证实，但仍有许多国家（如德国、荷兰和瑞典等）的经验发现表明随着教育供给的增加，教育机会不平等确实下降了。MMI 理论解释不了这些国家的情况。其

次，MMI 理论仅仅关注总体受教育机会（“数量”）的不平等，忽略了教育质量的差异。正因如此，卢卡斯（Lucas，2001）对 MMI 理论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 EMI）理论，认为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如果饱和，从而导致总体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但教育不平等仍会以有效的方式维持着。卢卡斯（Lucas，2001）认为教育不平等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数量上的（即总体受教育机会），另一个是质量上的，即同一阶段的教育存在着质量的差异，有的学校更好（如重点学校或学术教育轨道），文凭更加有价值。他进而认为，即使数量上的不平等下降，但质量上的不平等仍会维持，即优势阶层更可能获得质量更高的教育机会。卢卡斯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证明了他的这一理论。

笔者认为，EMI 理论 MMI 理论更加适合理解那些采用精英教育体制的国家与社会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前所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选择的原因，国家领导人和教育管理部门采纳了精英教育体制模式，各教育阶段都明确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而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亦同时形成了学轨制（下一小节详述）。正因如此，本研究将借鉴 EMI 理论视角，检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各教育阶段不同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以此理解中国社会教育不平等的结构与特征。

三、中国的重点学校制度、学轨制与教育路径分化： 研究假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普及教育，提高整体国民素质，扩大所有人受教育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处理这一矛盾，中央领导人提倡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集中稀缺的教育资源培养国家需要人才（Pepper，1978）。1953 年 5 月，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1959 年，周恩来总理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1962 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史料参见杨东平，2006：33-34）。重点学校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文化大

革命”介绍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重点学校制度。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办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参见刘精明，2004：67）。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部门开始认识到重点学校制度对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并明确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但是重点学校仍“名忘实存”，或者以其他名义（如实验学校、示范学校、一级学校等）存在着，形成了一种“没有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制度”（刘远碧，2009）。另外，在高中和大学阶段，重点学校制度一直存在着，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义和称呼可能发生了变化。^①

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重点学校制度确实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可以高效快速选拔和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重点学校制度可能成为中下阶层孩子步入精英大学的途径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并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梁晨等人（2012）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重点学校特别是县一级重点中学设置是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重要通道，从而为中下阶层的孩子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尽管如此，重点学校制度给教育公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则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有学者指出，由于财政资源、优秀师资和生源都向重点学校集中，这种制度加剧了教育的城乡、地区和阶层差距，并成为阻碍社会流动，复制和凝固社会差距的制度（杨东平，2005；2006）。

除了重点学校制度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决策部门也一直很重视职业教育，建立了大批初等、中等（包括中专、职高、技工等）和高等职业（大专）学校，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震等人，2008）。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学轨制的形成，即学生在各教育阶段升学时就存在职业教育和普通（学术）教育的分流并导致与之相关的教育公平问题。在中国，学轨制所涉及的教育公平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职业教育二流化”问题，即由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包括财政投入、师资和各项硬件环境）都不及普通教育，而且其生源大部分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因此职校生与普通学校生相比被置于二流学生的

^① 例如，中国的高校分级制曾经分为国家教委直属重点大学、部属重点大学、省属重点大学和各级普通大学；当前则有“211工程”大学、“985”大学、“一本”或“二本”等不同标准的区分。称呼虽然不同，但同样是划分不同等级或学校质量的标准。

境地（和震等人，2008）。

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这两种制度安排的直接后果就是相同教育层次的学校存在等级、质量和性质的差异，因此学生在各教育阶段升学时都会面临着路径选择或分流。在中国，重点学校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财力、师资、软硬件设施以及各种学习交流的机会等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个体如果被选拔进入重点学校，意味着可以享受上述优越的学习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或其他能力。同理，失去了进入重点学校的资格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职业教育和普通（学术）教育的分流则意味着学生进入不同的学制轨道，接受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教育，从而与不同的职业目标和社会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刘精明，2004）。总而言之，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从本质上讲是国家制度安排或制度框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刘精明，2004）。

国内外教育分层研究的结果表明，教育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即个体的教育机会受到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子女的教育成就更高（Raftery & Hout, 1993; Shavit & Blossfeld, 1993; 李春玲, 2003, 2010; 郝大海, 2007）。卢卡斯的EMI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教育不平等包括“数量”（总体教育机会）和“质量”（学校等级或学制轨道）两个层面的差异，高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获得级别或质量更高的教育（Lucas, 2001）。本研究关注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阶段教育路径的选择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结合EMI理论的逻辑以及中国因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所导致的学校等级分层和学生分流的事实，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获得重点学校教育机会存在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进入各阶段（初中、高中和大学）重点学校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 2: 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路径选择存在阶层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路径而非职业教育路径。

另外，如前所述，由于进入重点学校意味着有更好的师资力量以及更优越的学校软硬件环境，这些优越的教育条件无疑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校成绩和其他方面的能力，从而让他们在下一阶段的升学竞争

中更具优势。因此, 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是有累积性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的效应的。亦即是说, 如果一个学生在较早的求学阶段进入重点学校学习, 他(她)在后续的求学阶段亦更可能获得高级别或高质量学校的入学资格。具体的研究假设为:

假设 3a: 重点初中学校毕业生更可能获得重点高中学校的入学资格; 重点高中毕业生也更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

假设 3b: 重点初中学校毕业生更可能进入普通高中(而非职业高中)轨道; 重点高中毕业生也更可能获得本科(而非大专)学校的入学资格。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通过分析“2008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①数据来验证上一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 CGSS2008 调查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抽取了一个 6000 人的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该数据收集了被调查者非常详细的教育信息, 包括被调查者每一个求学阶段的起止时间、学校或文凭的类型(如专科或本科, 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等)和级别(重点或非重点)等等。另外, 数据也收集了本研究所需的被访者的家庭背景方面的信息。总体而言, 该数据能为本研究提供充分的经验数据资料。本研究只关注那些在 1978 至 2008 年间有可能升入初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中专、职高和技工)和大学(大专和本科)的样本。各教育阶段的有效样本量和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变量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未升学	.146	.354	.431	.495	.684	.465
升学情况 1						

^① CGSS2008 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负责收集, 详细的资料请参考该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gss.org/>

非重点	.769	.422	.438	.496	.255	.436
重点	.085	.279	.131	.338	.061	.239
升学情况 2						
普通高中	--	--	.431	.495	--	--
职高/技工/中专	--	--	.139	.346	--	--
大专	--	--	--	--	.165	.371
本科	--	--	--	--	.151	.358
升学前学历 (非普通高中=1)	--	--	--	--	.267	.443
民族(汉族=1)	.927	.260	.941	.236	.946	.227
性别(男性=1)	.475	.499	.496	.500	.522	.499
14岁时主要居住地						
农村	.533	.499	.479	.499	.285	.451
镇和县城	.186	.389	.207	.405	.279	.448
地级市	.158	.365	.177	.382	.230	.421
省会或直辖市	.123	.328	.136	.343	.206	.405
14岁时父亲 ISEI (除以 10)	3.435	1.671	3.579	1.740	3.935	1.833
父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7.607	4.326	7.925	4.333	8.871	4.240
兄弟姐妹人数	2.239	1.731	2.196	1.716	1.890	1.613
历史阶段						
1978-1988	.523	.499	.423	.494	.299	.458
1989-1998	.289	.453	.350	.477	.339	.473
1999-2008	.188	.391	.227	.419	.362	.481
有效样本量	3061		2915		1768	

(二) 变量^①

1. 因变量

根据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关心中国居民在初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中专、职高和技工)以及大学(大专和本科)三个教育层次的升学路径选择情况, 因此研究的因变量包括:

^①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未显示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有兴趣的读者请与作者联系(电子邮件: yuxiaowu@gmail.com)

(1)初中层次的升学路径,包括3类,分别为未升学、升上非重点初中、升上重点初中。这一层次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所有上过小学的本。

(2)高中阶段的升学路径由两个变量组成,其一是重点与非重点的路径,包括3类,分别是未升学、升上非重点高中、升上重点高中;其二是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的路径,也包括3类,分别是未升学、升上普通高中、升上职业高中(中专和技工)。这一层次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所有上过初中的样本。

(3)与高中阶段相似,大学阶段的升学路径也有两个变量,其一是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路径,包括3类,分别是为升学、升上非重点大学、升上重点大学;其二是大专和本科的路径,也包括3类,分别是未升学、升上大专、升上本科。这一层次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所有上过高中或职高(中专和技工)的样本。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之一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根据已有的文献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笔者通过14岁时主要居住地、父亲的职业地位以及父母亲的教育来测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1)14岁时主要居住地。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的二元社会分割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巨大差距之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城镇户口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差异,户口所在的城市级别越高,户口持有者所享受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越丰富(边燕杰等人,2006;陆益龙,2008)。在教育资源的分布方面,农村地区在教育资源如学校数量和硬件设施以及师资条件等方面远远落后与城镇地区,而且城市的级别越高,教育资源越丰富,重点学校的分布也更加密集。因此,除了区分城镇和农村户口之外,仍需要兼顾城镇户口内部的等级分化。CGSS2008询问了被访者14时的主要居住地的城市等级。经过整理,笔者将14岁时主要居住地分成4类,分别为农村、镇和县城、地级市以及省会或直辖市(在回归模型中,农村为参照组)。

(2)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根据已有文献的习惯做法,本研究使用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CGSS2008调查使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记录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职业类型,笔者依此转化为“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Ganzeboom, ed al., 1992)。它是一个连续变量,取值介于19-88之间,分数越高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

高。

(3)父母亲的教育程度。已有的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父亲的职业地位变量,父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仍有重要的影响作用(Shavit & Blossfeld, 1993)。根据惯例,本研究使用父母双方中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此变量的测量方式。

另外,为了检验优质教育机会的累积性优势效应(即较早的阶段如果获得重点学校的资格,那么后续的教育阶段也更可能获得优势的教育机会),本文的核心自变量还包括前一阶段是否就读于重点学校(是=1,否=0)。^①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历史时期(笔者将1978-2008整个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78-1988、1989-1998和1999-2008,代表改革的三个10年,在统计模型中,1978-1988阶段为参照组。)、性别(男性=1)、民族(汉族=1)以及兄弟姐妹人数。^②

(三) 统计模型

由于本研究所有的因变量都是类别变量,而且都包括3类,因此,笔者使用多元对数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进行统计估计。该模型可以被视作简单(二元)对数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扩展形式(Powers & Xie, 2000)。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模型设定,可以通过改变因变量的参照组从而实现各组之间的相互比较。举个例子说明,就本研究而言,除了分别比较非重点学校组与未升学组以及重点学校组与未升学组之间的家庭背景差异之外,还可以直接检验重点组与非重点组之间的家庭背景差异。因此,无论从统计方法还是从研究的实质需要的角度考虑,该模型都是最佳的选择。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 小学升初中的不同路径

^① 由于CGSS2008没有收集小学阶段是否在重点学校就学的信息,因此这个变量仅在高中(包括普通高中、中专、职高和技工)阶段和大学(大专和本科)阶段的统计模型中进行估计。

^②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兄弟姐妹人数是影响教育获得一个重要变量(Blake, 1981; 叶华、吴晓刚, 2011; 吴愈晓, 2012; 2013)

表 2 报告了小学升初中入学路径的模型估计结果。左列的模型比较的是进入非重点初中与未升学的情况，中间一列比较的是进入重点初中与未升学的情况，而右列的模型则是重点初中与非重点初中之间的直接比较。首先可以发现，与预期相一致，14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的户口级别越高，升学初中（无论非重点或是重点初中）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左边两列的模型显示，14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三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而且显著，表明城镇地区的学生比农村地区的学生更可能升入非重点或重点初中；而且，居住地的级别越高，回归系数越大。其次，父亲的职业地位（14 岁时父亲的 ISEI）越高，子女升学初中（包括非重点和重点）的机会越大。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亲的 ISEI 每增加 10 个单位，子女升学非重点初中和重点初中（相对于未升学而言）的几率分别增加 30%（ $e^{0.260} - 1 \approx 0.297$ ， $p < 0.001$ ）和 39%左右（ $e^{0.331} - 1 \approx 0.392$ ， $p < 0.001$ ）。另外，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升学初中（非重点或重点）的机会也越大。控制了其他因素，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升学非重点初中的几率增加 15%左右（ $e^{0.138} - 1 \approx 0.148$ ， $p < 0.001$ ），而升学重点初中的几率增加的幅度更大，约为 23%（ $e^{0.208} - 1 \approx 0.231$ ， $p < 0.001$ ）。

表 2 估计小学升初中教育分流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1978-2008）

变量	非重点	重点	重点
	VS. 未升学	VS. 未升学	VS. 非重点
历史时期 ^a			
1989-1998年	.635*** (.145)	.815*** (.210)	.180 (.162)
1999-2008年	.818** (.265)	1.057** (.329)	.239 (.214)
民族（汉族=1）	1.050*** (.182)	.298 (.275)	-.752** (.232)
性别（男性=1）	.566*** (.117)	.245 (.174)	-.321* (.136)
兄弟姐妹数量	-.092**	-.204**	-.113+

	(.035)	(.065)	(.058)
14岁以前主要居住地 ^b			
镇和县城	.588** (.184)	1.436*** (.247)	.848*** (.182)
地级市	1.000*** (.259)	1.556*** (.319)	.556** (.203)
省会或直辖市	1.641*** (.358)	2.035*** (.414)	.394+ (.224)
14岁时父亲ISEI (除以10)	.260*** (.060)	.331*** (.070)	.071+ (.040)
父母亲受教育年限	.138*** (.016)	.208*** (.025)	.071*** (.020)
常数项	-1.410*** (.291)	-3.972*** (.447)	-2.562*** (.368)
<i>N</i>	3054		
Log-likelihood	-1791.45		
pseudo <i>R</i> ²	.155		

注：(1)^a 1978-1988年为参照组；^b 农村为参照组。(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3)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表2右列的模型显示了升学重点和非重点初中之间的比较结果。可以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对升学非重点或重点初中的路径差异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居民，更可能上重点初中。首先，14岁居住地三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向而且显著，表明城镇或城市地区学生更可能上重点初中（相对于上非重点初中而言）。另外，其他因素保持不变，14岁时父亲的ISEI每增加10个单位，子女上重点初中（相对于非重点初中而言）的几率增加大约7%（ $e^{0.071} - 1 \approx 0.074$, $p < 0.10$ ）；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子女上重点初中（相对于非重点初中而言）的几率也增加大约7%（ $e^{0.071} - 1 \approx 0.074$, $p < 0.001$ ）。

表2的结果表明，在初中阶段，升学与否以及能否进入重点中学就读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直接相关的。越高阶层的人不仅有更高的升学机会，而且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进重点初中）。这里的结果

验证了假设 1，亦与 EMI 的理论假定基本一致，即优势阶层在教育获得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

（二）初中升高中的不同路径

1. 重点 Vs. 非重点

表 4a 的模型反映的是重点与非重点高中路径选择的差异（目的是为了检验重点学校制度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可以发现，左边两列“14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三个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在 0.001 的水平显著，表明城镇地区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升学（非重点或重点）；另外，回归系数的大小与城市级别成正比，表明居住地的级别越高，获得高中（非重点或重点）阶段学习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直接比较上重点和非重点高中的情况（模型 1 的右列），结果非常有意思，（相对于上非重点高中而言）镇、县城和地级市居民上重点高中的几率与农村居民没有显著差异（镇和县城以及地级市两个虚拟变量系数不显著），而省会或直辖市居民升学重点的几率甚至比农村居民低。具体说来，控制了其他变量，直辖市居民上重点高中（相对于非重点高中而言）的几率比农村居民要低 31% 左右（ $1 - e^{-0.370} \approx 0.309$ ， $p < 0.10$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因为总体而言，农村户口的孩子更不可能升学高中，而成功升学并选择上高中的都应该是成绩比较优秀并有志于上大学的孩子，因此考进重点学校就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亦即是说，大多数农村孩子要么不上高中，要么就上重点高中。而省会或直辖市地区的孩子高中升学率较高，大多数孩子都有机会上高中，但由于重点中学的数量毕竟较少，因此上重点中学的比例相对较低。正因为省会或直辖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在这个选择性过程的差异，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所有成功升学的孩子而言，农村孩子上重点学校的几率更高。

表 4a 估计初中升高中教育分流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一）
（1978-2008）

变量	模型1			模型2		
	非重点	重点	重点	非重点	重点	重点
	VS.	VS.	VS.	VS.	VS.	VS.
	未升学	未升学	非重点	未升学	未升学	非重点

历史时期 ^a						
1989-1998年	.266*	.343*	.077	.265*	.361*	.096
	(.108)	(.161)	(.154)	(.108)	(.173)	(.169)
1999-2008年	.491***	.675***	.183	.491***	.717***	.226
	(.137)	(.190)	(.175)	(.137)	(.204)	(.192)
民族(汉族=1)	.284	-.315	-.600*	.299	-.0935	-.392
	(.193)	(.241)	(.234)	(.194)	(.261)	(.261)
性别(男性=1)	.270**	.175	-.095	.261**	.313*	.052
	(.089)	(.127)	(.119)	(.089)	(.137)	(.131)
兄弟姐妹数量	-.145***	-.212***	-.067	-.145***	-.178**	-.033
	(.032)	(.052)	(.051)	(.032)	(.055)	(.055)
14岁以前主要居住地 ^b						
镇和县城	.844***	1.025***	.181	.858***	.777***	-.082
	(.118)	(.169)	(.163)	(.118)	(.182)	(.178)
地级市	1.112***	1.241***	.130	1.118***	1.134***	.016
	(.135)	(.186)	(.172)	(.135)	(.199)	(.187)
省会或直辖市	1.642***	1.272***	-.370+	1.655***	1.126***	-.529*
	(.160)	(.224)	(.195)	(.160)	(.239)	(.214)
14岁时父亲ISEI (除以10)	.097**	.155***	.058+	.095**	.148***	.053
	(.030)	(.039)	(.035)	(.030)	(.042)	(.038)
父母亲受教育 年限	.079***	.122***	.043*	.081***	.104***	.023
	(.012)	(.018)	(.017)	(.012)	(.019)	(.019)
初中是否重点 (是=1)				-.327	2.295***	2.622***
				(.201)	(.186)	(.170)
常数项	-1.731***	-2.945***	-1.214***	-1.742***	-3.464***	-1.722***
	(.262)	(.363)	(.353)	(.264)	(.390)	(.386)
<i>N</i>	2908			2908		
Log-likelihood	-2513.28			-2366.06		
pseudo <i>R</i> ²	.128			.179		

注：(1)^a 1978-1988年为参照组；^b 农村为参照组。(2)+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3)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从表 4a 的模型 1 还可以发现, 父亲的职业地位 (14 岁时父亲的 ISEI) 越高, 子女升学 (包括非重点和重点) 的机会越大。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父亲的 ISEI 每增加 10 个单位, 子女升学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 (相对于未升学而言) 的几率分别增加 10% ($e^{0.097} - 1 \approx 0.102$, $p < 0.01$) 和 17% 左右 ($e^{0.155} - 1 \approx 0.168$, $p < 0.001$)。另外, 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 子女升学的机会也越大。控制了其他因素, 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子女升学非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 8% 左右 ($e^{0.079} - 1 \approx 0.082$, $p < 0.001$), 而升学重点高中的几率增加的幅度更大, 约为 13% ($e^{0.122} - 1 \approx 0.130$, $p < 0.001$)。而且, 如果直接比较升学重点和非重点高中之间的情况 (模型 1 的右列), 可以发现, 对所有上高中的学生而言, 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受教育年限越高, 越可能上重点学校。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14 岁时父亲的 ISEI 每增加 10 个单位, 子女上重点高中 (相对于非重点高中) 的几率增加大约 6% ($e^{0.058} - 1 \approx 0.060$, $p < 0.10$); 父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增 1 年, 子女上重点高中 (相对于非重点高中) 的几率增加大约 4% ($e^{0.043} - 1 \approx 0.044$, $p < 0.05$)。总体而言, 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 1, 亦符合 EMI 的理论假定, 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可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表 4a 的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变量——“初中是否重点”, 目的是为了检验前一阶段的教育经历如何影响现阶段的教育路径选择。首先, 模型 2 左列的结果显示, 相对于未升学而言, 毕业于重点初中的学生与毕业于非重点初中的学生相比进入非重点高中学校的机会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 初中是否在重点学校学习对高中阶段是否进重点学校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因为模型 2 中列显示,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重点初中毕业生升学重点高中 (相对于未升学) 的几率是非重点初中毕业生的 10 倍 ($e^{2.295} \approx 9.92$, $p < 0.001$)。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两个路径直接比较亦显示前一阶段重点学校的经历对下一阶段获得重点学校教育的机会异常重要。模型 2 的右列显示, 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重点初中毕业生升学重点高中的几率 (相对于升学非重点高中) 是非重点初中毕业生的 14 倍 ($e^{2.622} \approx 13.76$)。因此, 优质教育的累积性优势效应 (即假设 3a) 得到了验证。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 表 4a 显示, 加入“初中是否重点”变量之后, 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改善了, 伪决定系数 (pseudo R^2) 从模型 1 的 0.128 大幅上升至模型 2 的 0.179, 这表明该变量对解释高中阶段重点与非重点的路径分流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 对比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右列可以发现，加入了“初中是否重点”变量之后，14 岁时父亲 ISEI 和父母受教育年限两个变量对升学重点高中（相对于非重点高中而言）的正面效应变得没有统计显著性了，这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通过帮助孩子早期（初中阶段）获得进入重点学校的资格，得到优质的教育机会并可能有更高的升学考试成绩，从而使他们在后续的教育历程中更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另外，个人如果早期获得了优质教育机会，其后续阶段的优势地位可以脱离家庭的直接帮助而得到持续甚至是累加。

2. 普通高中 Vs. 职业高中

表 4b 反映了高中阶段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中专和技工）的路径分流情况。首先从模型 1 的左边两列可以发现，居住地的级别越高，升学的可能性（无论是普通高中还是职高）越大。如果仅仅比较两个成功升学的群体（模型 1 的右列），我们发现镇、县城和地级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普高和职高的路径分流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省会或直辖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可能选择普通高中的路径。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省会或直辖市居民升学职高（相对于普高而言）的几率比农村居民低 42% 左右（ $1-e^{-0.541} \approx 0.418$ ， $p < 0.01$ ）。另外，与预期一致，相对于未升学而言，家庭经济地位（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亲教育）越高，子女升学普高（模型 1 左列）和职高（模型 1 中列）的可能性越大。如果直接比较职高与普高的路径分化（模型 1 右列），我们可以发现父亲职业地位（14 岁时父亲 ISEI）对这两种路径分流没有影响，但父母亲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作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升学职高（相对于普高）的几率下降约 4%（ $1-e^{-0.038} \approx 0.037$ ， $p < 0.05$ ）。这里的结果部分证实了假设 2，同时亦表明，子女在高中阶段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路径选择更多受父母教育（家庭文化资本因素）的影响，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表明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而子女更可能选择普通高中（学术教育路径）。

表 4b 估计初中升高中教育分流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二）
（1978-2008）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普高 VS.	中专、职高 VS.	中专、职高 Vs.	普高 VS.	中专、职高 VS.	中专、职高 Vs.

	未升学	未升学	普高	未升学	未升学	普高
历史时期 ^a						
1989-1998年	.142 (.110)	.717*** (.154)	.575*** (.151)	.145 (.111)	.719*** (.154)	.574*** (.151)
1999-2008年	.427** (.138)	.886*** (.188)	.459** (.178)	.427** (.139)	.887*** (.189)	.460** (.178)
民族(汉族=1)	.120 (.189)	.159 (.260)	.038 (.255)	.193 (.191)	.211 (.261)	.018 (.256)
性别(男性=1)	.267** (.090)	.195 (.122)	-.0710 (.116)	.287** (.091)	.208+ (.122)	-.079 (.116)
兄弟姐妹数量	-.155*** (.033)	-.162*** (.047)	-.006 (.048)	-.148*** (.033)	-.157*** (.047)	-.009 (.048)
14岁以前主要居住地 ^b						
镇和县城	.919*** (.119)	.792*** (.160)	-.127 (.156)	.870*** (.120)	.760*** (.161)	-.110 (.157)
地级市	1.192*** (.136)	1.002*** (.180)	-.190 (.167)	1.172*** (.136)	.989*** (.180)	-.182 (.167)
省会或 直辖市	1.713*** (.162)	1.172*** (.216)	-.541** (.187)	1.707*** (.162)	1.170*** (.216)	-.537** (.187)
14岁时父亲 ISEI(除以10)	.097** (.030)	.150*** (.038)	.054 (.035)	.092** (.030)	.147*** (.039)	.055 (.035)
父母受教育 年限	.097*** (.013)	.059*** (.017)	-.038* (.017)	.094*** (.013)	.058*** (.017)	-.036* (.017)
初中是否重点 (是=1)				.803*** (.171)	.591** (.216)	-.212 (.179)
常数项	-1.721*** (.262)	-2.897*** (.364)	-1.176** (.359)	-1.838*** (.265)	-2.983*** (.366)	-1.146** (.359)
<i>N</i>		2908			2908	
Log-likelihood		-2541.96			-2530.22	
<i>d</i>						
pseudo <i>R</i> ²		.125			.129	

注：(1)^a 1978-1988年为参照组；^b 农村为参照组。(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3)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表 4b 的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初中是否重点”变量。结果显示，重点初中毕业生升学普高或职高的机会比非重点初中毕业生都要高。如果单从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数字大小来比较，升学普高（回归系数为 0.803）的可能性比职高（0.591）更高一些。但是模型 2 右列两者检验的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并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对所有成功升学的人而言，重点或非重点初中毕业生的路径选择（选择普高或职高）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里的结果没有验证假设 3b。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特别是 1999 年高等教育大幅扩招之前，大学阶段的录取率较低，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当时许多中专和技工学校（特别是与金融、能源、邮电和师范有关的中专学校）毕业生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这些中专学校吸引了许多来自中上层家庭而且学习成绩相当不错的初中毕业生。^①

（三）高中升大学的不同路径

表 4 报告了大学阶段不同升学路径的回归模型估计结果。^② 其中模型 1 反映的是重点与非重点大学路径分流的情况，而模型 2 反映的是大专和本科路径分流的情况。

1. 重点大学 Vs. 非重点大学

表 4 的模型 1 显示，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大学阶段的升学机会（无论是非重点大学还是重点大学）并不受到居住地级别的影响，因为模型 1 左列和中列“14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所有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另外，模型 1 右列的结果显示，“14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变量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表明对于所有成功升学大学阶段的人来说，他们进入重点大学或非重点大学的路径差异也不受居住地级别的影响。这里的结果表明高考录取（对于有相同资格的学生而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父亲的职业地位有助于子女获得非重点大学的求学机会。模型 1 的左列显示，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亲 ISEI 每增加 10 个单位，子女升学非重点大学（相对于未升学）的几率提高 9% 左右（ $e^{0.083} - 1 \approx 0.087$ ，

^①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及其相关政策的变化，参见和震等人（2008）。

^② 根据我国的教育政策，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中专、职高和技工等）的学生也有上大学的资格，由于他们与普通高中生接受的是不同性质的教育，而且升学考试的内容和条件也不相同，因此这两个群体升大学的机会会有很大的差异。为控制这种差异，笔者在表 3 的所有模型中增加了一个控制变量——“高考前学历”（非普通高中生=1，普通高中生=0）。

$p < 0.05$)。但是, 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升学重点大学的机会没有影响(模型 1 中列)。另外, 从模型 1 右列可以发现, 对于所有升上大学的人而言, 重点或非重点大学的路径分化也不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

父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大学(重点或非重点)机会的获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 1 的左列和中列显示, 其他因素保持不变, 母亲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 子女升入非重点大学(相对于未升学)的几率增加 5%左右($e^{0.052} - 1 \approx 0.053$, $p < 0.01$), 而升入重点大学(相对于未升学)的几率则增加 11%($e^{0.106} - 1 \approx 0.112$, $P < 0.01$)。但模型 1 右列显示, 对于成功升学的人而言, 他们重点和非重点的路径分化并不受父母教育的影响。

另外, 表 4 的模型 1 显示高中阶段是否就读于重点学校对上大学以及重点或非重点大学的路径分化非常重要。其他因素不变, 相对于未升学者而言, 重点高中毕业生进入非重点大学和重点大学学习的几率分别是非重点高中毕业生的 2.8 倍($e^{1.011} \approx 2.75$, $p < 0.001$)和 6.5 倍($e^{1.870} \approx 6.49$, $p < 0.001$)。而模型 1 的右列显示, 这两个数字的差别是统计显著的。对于所有考上大学的人而言, 重点高中生考上重点大学的几率是非重点高中生的 2.4 倍($e^{0.859} \approx 2.36$, $p < 0.001$)。这里的结果支持假设 3a。

表 4 估计高中升大学教育分流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 (1978-2008)

变量	模型1			模型2		
	非重点	重点	重点	大专	本科	本科
	VS. 未升学	VS. 未升学	VS. 非重点	VS. 未升学	VS. 未升学	VS. 大专
历史时期 ^a						
1989-1998年	.763*** (.184)	.069 (.341)	-.693+ (.358)	.712*** (.205)	.560* (.247)	-.152 (.287)
1999-2008年	1.517*** (.201)	1.229*** (.335)	-.288 (.347)	1.434*** (.224)	1.454*** (.256)	.0201 (.292)
高考前学历 (非普高=1)	-2.781*** (.246)	-2.829*** (.524)	-.048 (.563)	-2.330*** (.247)	-3.879*** (.517)	-1.549** (.558)

民族（汉族=1）	.048 (.312)	-.139 (.473)	-.188 (.467)	.012 (.334)	.049 (.389)	.037 (.408)
性别（男性=1）	.173 (.131)	.582* (.226)	.409+ (.225)	.220 (.145)	.280+ (.164)	.059 (.176)
兄弟姐妹数量	-.224*** (.056)	-.216* (.102)	.008 (.105)	-.126* (.060)	-.395*** (.080)	-.269** (.088)
14岁以前主要居住地 ^b						
镇和县城	-.014 (.185)	-.297 (.328)	-.282 (.331)	.045 (.202)	-.224 (.242)	-.269 (.263)
地级市	.018 (.200)	.055 (.332)	.037 (.334)	.133 (.218)	-.129 (.252)	-.262 (.273)
省会或直辖市	.138 (.202)	-.340 (.372)	-.477 (.373)	.024 (.229)	.114 (.255)	.090 (.283)
14岁时父亲ISEI （除以10）	.083* (.040)	.052 (.067)	-.031 (.066)	.046 (.044)	.114* (.049)	.068 (.052)
父母亲受教育 年限	.052** (.019)	.106** (.034)	.054 (.034)	.052* (.021)	.076** (.025)	.024 (.027)
高中是否重点 （是=1）	1.011*** (.151)	1.870*** (.232)	.859*** (.226)	.887*** (.168)	1.600*** (.177)	.714*** (.183)
常数项	-2.226*** (.443)	-4.054*** (.742)	-1.828* (.752)	-2.560*** (.482)	-3.010*** (.571)	-.450 (.625)
<i>N</i>	1762			1762		
Log-likelihood	-1046.44			-1146.41		
pseudo <i>R</i> ²	.236			.227		

注：(1)^a 1978-1988年为参照组；^b 农村为参照组。(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3)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2. 大专 Vs. 本科

表4的模型2反映了大学阶段大专和本科两种升学路径的分流情况。首先可以发现，大学阶段的升学机会以及升学后大专和本科的路径选择并不受到居住地级别的影响，因为模型2中“14岁以前主要居住地”所有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获得大专入学资格没有显著的影响（模型

2 左列),但是有助于子女本科入学的资格(模型 2 中列)。具体说来,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亲的 ISEI 每增加 10 分,子女考上本科大学(相对于未升学)的几率提高 12%左右($e^{0.114} - 1 \approx 0.121$, $p < 0.05$)。但模型 2 右列的结果表明,对于所有升学者而言,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他们大专本科的路径差异没有显著的作用。父母亲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子女升学大专或本科的机会。具体说来,相对于未升学者而言,父母亲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子女升学大专和本科的几率分别增加约 5% ($e^{0.052} - 1 \approx 0.053$, $p < 0.05$) 和 8% ($e^{0.076} - 1 \approx 0.079$, $p < 0.01$)。但是从模型 1 的右列可以发现,对于所有成功升学者而言,父母亲的教育对大专和本科的路径差异也没有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这里的结果与假设 2 所预测的情况并不一致。

另外,模型 2 的左列和中列显示,控制了别的变量,重点高中毕业生考上大专和本科院校(分别相对于未升学而言)的几率分别是非重点高中毕业生的 2.4 倍($e^{0.887} \approx 2.43$, $P < 0.001$) 和 5 倍($e^{1.600} \approx 4.95$, $P < 0.001$)。而且模型 2 右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所有成功考上大学的人而言,是否毕业于重点高中是影响他们大专和本科的路径差异的,重点高中生考上本科院校(相对于考上大专)的几率是非重点高中生的 2 倍($e^{0.714} \approx 2.04$, $p < 0.001$)。这里的结果支持假设 3b。

六、结论与讨论

使用 CGSS2008 数据,本文探讨了 1978 至 2008 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在初中、高中和大学三个教育层次的升学路径分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小学升初中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获得重点学校的教育机会有显著的作用。具体说来,居住地的级别越高,越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就学;另外,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进入重点中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初中升高中阶段的路径分成两类,一是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路径差异,二是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与初中阶段的情况一致,居住在较高城市级别,父亲的职业地位较高或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较高的孩子,更可能进入重点高中读书;另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也更可能选择学术教育(普通高中)的路径。

与前两阶段的情况相比，高中升大学阶段的路径分流情况显得较为平等一些，具体表现为居住地级别和父亲的职业地位对重点与非重点或大专与本科的路径分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父母亲的教育仍对孩子是否能进重点大学有显著的决定作用。

以上研究发现表明“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Lucas，2001）也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即优势阶层更可能享受质量较优的教育。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有一个发现值得强调，即早期阶段是否获得优质的教育对后续教育的路径分流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重点初中的毕业生进入重点高中就读的机会大大高于非重点初中毕业生，而重点高中毕业生进入重点大学（或本科院校）的机会也比非重点高中毕业生高出好几倍。这种现象表明在采用精英教育体制（重点学校制度）的社会中，早期获得重点学校的机会是有累积性优势的效应的。

总而言之，由于在各教育阶段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存在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有累积性。基于这样的事实，精英教育体制实质是一个扩大阶层差距而不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因此，笔者认为，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 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和震、王秋、张眉、崔剑，2008，《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构建》，于张秀兰主编《中国教育发展与政策30年》（第五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春玲，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与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9-2001）》，《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 2012，《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术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精明，2004，《教育选择方式及其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刘远碧, 2009,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回顾及思考》, 《河南教育(基教版)》第1期。
- 陆益龙, 2008,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王威海、顾源, 2012,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吴晓刚, 2009,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社会》第5期。
- 吴愈晓, 2012,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第4期。
- , 2013,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杨东平, 2005, 《重新审视重点学校制度》, 《群言》第4期。
- , 2006,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叶华、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中国教育部, 2011, 《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中国教育报》7月6日第2版。
- Blake, Judith 1981, "Family Siz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Demography* 18.
-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M. De Graaf & Donald J. Treiman 1992,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1.
- Guo, Maocan & Wu, Xiaogang 2010, "Trends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81-2006." In Christian Suter, volume of World Society Studies, *Inequality beyond Globalization*.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ucas, S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 Pepper, Suzanne 1978, "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8.
- Powers, Daniels A. & Xie, Yu 2000,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aftery, A. E. & M.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
- Shavit, Yossi & Hans-Peter Blossfeld (eds) 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havit, Yossi & Walter Mueller 2000,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Tracking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aureen T. Hallinan (ed.), *Handbook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Plenum Publishing.
- Turner, Ralph 1960,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 Zhou, Xueguang, Phyllis Moen & Nancy B. Tuma 1998,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